

## 宗藩体制解体与东北亚乱局

作者：马勇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2-24

### 宗藩体制解体与东北亚乱局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东北亚问题成为国际焦点和危险地区之一，是近代以来国际局势再演再变的结果。中国面对近代化压力不得不放弃“王道政治”，直面自己的内部问题，力图建立近代国家，对于先前各藩邦受到列强或近邻的侵害，清政府无力亦无心继续予以救助，于是先前行之有效的宗藩体制解体，并导致至今扰攘不宁的东北亚乱局。

关键词：宗藩体制 东北亚 中日关系

the system of vassal state disintegrate and the Northeast Asia to confusion  
mayong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Northeast Asia is becoming the international focus and one of the dangerous regions, was the result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revolved since modern times. Qing dynasty had to abandon the "government politics" confronting modernization, to facing its own inherent questions, striving to establish a modern country. About the big powers or neighbor encroaching vassal state, Qing dynasty was unable and unwillingly continue to help them. So the effective system of vassal state disintegrate, and it led the Northeast Asia to confusion until today.

The key words: the system of vassal state the Northeast Asia Sino-Japan relation

进入近代之后，东北亚问题一直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成为影响远东乃至世界全局的重要火药桶之一。1894年的中日战争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第一次动用军队也为此而来。因此怎样结束东北亚的乱象，除现实政治考量外，应该注意其与历史传统的关联度，因为在前近代的历史上，这一地区并非如此。

在西方势力渗透到东北亚地区以前，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享有完整的行政主权，但由于与中华帝国有着某种程度的藩属关系，受到中华帝国在各方面的关照与保护。此时的中华帝国对这些国家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因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长期过程中，中华帝国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竭力维护中华帝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和平及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中华帝国不会出自动武，更不会纵容或支持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挑衅、欺侮。中华帝国的尊严、信誉大于一切，与藩属诸国的所有交往，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得失利弊。

然而，当西方势力开始向亚洲渗透后，中华帝国在西方的强势压力下逐步退却，它虽然有心继续维持帝国与各周边藩邦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实在说来已力不从心，西方势力不仅要使中华帝国的宗藩变成自己的宗藩或势力范围，它们在根本目标上是要将中华帝国纳入西方势力主导下的所谓世界一体化的新秩序中，中华帝国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尊严丧失殆尽，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西方势力的殖民范围。帝国素来信奉和坚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转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国家所向披靡、所向无敌的所谓“进化论”。

进化论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严复在解读西方这一近代思想时也曾注意它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华帝国古典政治学的范畴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为仅仅凭借“力”的角逐去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政治”，其与中华帝国一直信奉、遵守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是儒家伦理不太赞赏乃至根本反对的一种政治理论。只是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华帝国出于民族存续的现实需要，不得已放弃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转向自身力量的积聚，于是乎远东地区直至整个亚洲，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共主”，先前的各个藩邦在失去了中华帝国的保护之后只能依附于西方各个强势国家自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亚乱象的形成可能有许多的复杂因素，然而认真考究，可能与中华帝国立国原则的调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 宗藩体制开始解体

西方国家对中华帝国施压始于1790年代。随着中英之间贸易逆差的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无奈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接纳消化英国更多的工业品，于是英国人一方面寻求鸦片消弭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试图进入中国，由自己或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直接开发中国市场。

以鸦片平衡贸易逆差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利益，于是中英之间以鸦片的名义进行了两次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

至1880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与范围，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中国内地，将整个中国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

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和朝鲜的覬覦、窥视和骚扰，并最终导致了1880年代中期的中国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

中国的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因越南问题而引起。基于历史原因，越南在历史上比较长时间为中国的附属，只是后来因中国自身危机无暇顾及越南，而恰当此时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的控制。这在中国因一系列危机而无暇兼顾时，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是到了1880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运动的进行而使自己的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当中国的国力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的时候，大清王朝的统治者自然不能继续容忍越南脱离中国的企图，顽强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势力范围内，从而引发了与法国的矛盾冲突。法国的政治、经济势力正在东向，它的初期目标就是要将越南等中国南部藩属纳入自己的体系。

法国对越南的覬覦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占领与控制还是在1858年与中国达成《天津条约》之后。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不久又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对越南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的影响与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与安南（越南）当局在西贡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降为法国的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并唆使安南国王将刘永福和黑旗军从河内附近及红河三角洲赶出去。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这个条约，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是清廷坚守安南为中国的附属国这一原则，始终不予承认。

从中华帝国自古以来所信奉、遵守和执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从宗藩体制所具有的伦理观念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为自身力量的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使藩邦能够获得充分理解。很显然，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与宗藩体制下的伦理观念相反，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说期待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安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国军队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地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当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之前，当中国的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必要为安南这一附属国不惜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开战，却成了清廷内部持久争论的问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訢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有国际视野，最懂得近代国家的外交原则，其实转换一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张中国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前提下为周边藩邦履行责任和尽义务，所以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该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该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之间的冲突，既维护安南的利益，也不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相对比较清醒的政治家，恭亲王奕訢、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和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的消耗，几乎丧失殆尽，自18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虽然使中国的状况有所改善，国力有所提升，但那毕竟只是相对于原有落后的基础而言，毕竟时间也太短，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相比，当然也就不足与西方强国言战，更不要说正面交锋，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地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恭亲王奕訢与李鸿章等人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凉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在实际效果上给法国军队以打击，至少让法国军队不能那样顺利地得所欲为。

平心而论，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人的设计从现代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着可以一试的“好棋”。无奈，在传统爱国主义心态支配下，国人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的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内部相对比较边缘化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二十年的洋务运动已初见成效，或许是基于传统的宗藩观念和道义力量，对法国的扩张行动颇为不满，他们共同谴责恭亲王奕訢与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派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清廷的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sup>①</sup>1882年12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还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的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当中国的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的宗藩国家的条件，中国部分放弃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宗主权，也是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的北京协定并不被1883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议对印度支那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战争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同年8月，法国军队开始在红河盆地对黑旗军作战，并很快突破黑旗军的防线。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新协定，越南政府自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信誉无疑是一沉重打击。



黑旗军的失败尤其是越法新协定的签署极大地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二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提升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明确向清廷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sup>[②]</sup>他认为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法国以及其它西方强国就会乘机从南方直入中国本土，对中国进行商业和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清廷的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的同时，坚决要求派兵支持刘永福和黑旗军，收复失地，恢复和巩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而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的军政大员发动政变，并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廷最高统治层的回应，清廷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和广西调正规军五万人入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五万人的清军。中国军队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利用外部危机解决内部危机，乘机罢免了恭亲王奕訢的职务，委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的军队立即撤回；而法国则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并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李—福协定”或许是李鸿章心目中解决越南危机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协定却遭到了清流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鸿章的责任。该和约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订应该在三个月之后。可是法国方面在该和约商定后就要求中国驻越南的军队执行和约，从越南撤出，因此必然遭到中国军队的拒绝，6月23日，中法军队再次冲突，战事又起，尚未发生效力的“李—福协定”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够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广大的中国腹地。所以，和约的无效及军事冲突的再起使法国更有了战争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福协定”，并索赔大笔战争赔款。法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立场，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与法军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以突袭的方式攻击福州，仅仅一个小时就击沉中国十一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基隆港成功登陆，23日宣布封锁台湾岛。

与福建战线的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中国军队在经过几次失败后，又向越南派遣了大量援兵，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中国军队遂于1885年3月重新占领谅山，并准备向北宁、河内发动攻势。中国在军事上又获得了优势地位。

军事上的优势并没有促使中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北部边疆危机的再起及朝鲜问题的困扰，清廷决定乘谅山大捷的机会争取和平，以便赢得体面的结果。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这项条约，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地区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 东北亚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不败而败”表明二十余年的洋务新政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抗击列强，中国南方的朝贡国只好一个又一个接着丧失。1885年，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而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样一来，中国的南部边界实际上已面临着英法两国的共同威胁。

逐步被迫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附属国的宗主权，是清政府不得不选择的丢卒保车战略。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危险，除了国内的骚乱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那将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他们不愿意在越南这块“无用之地”上与法国人决战，以免列强乘虚而入，从北方尤其是从朝鲜进入中国。这也是清政府为什么在谅山大捷后急于与法国和解的一个理由。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政府有着深刻的教训，那就是琉球国的无端丧失。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大陆东方大海之中，东北方与日本九州岛隔海相望，东南方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根据可信的文献记载，琉球至少在隋朝时候即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联系，至明洪武年间，接受大明王朝的册封，称臣入贡。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开始在琉球培植势力，急剧扩展。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的宗藩关系。只是日本的措施并没有获得琉球国的认同，其统治者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不变更琉球的国体与政体。

琉球的坚持惹恼了日本，1879年3月，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统治者交出政权，接着宣布“废琉置县”，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的反抗，琉球派员前往天津谒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中国政府“尽逐日兵出境”。

然而此时中国的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边陲都相继出现的问题，清政府接受琉球的请求后，确曾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据理力争，然而终究没有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出兵奉有道而伐无道，维护琉球国的正当利益，主持正义与公道。“自为一国”的琉球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这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大清王朝作为宗主国的信誉、尊严，而且使其他藩邦感到失望与寒心，从而与宗主国离心离德。

日本战略目标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岛，它要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踏上大陆，就必须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和台湾。

对清政府来说，朝鲜不仅是重要的朝贡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来自日本及俄罗斯的威胁，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容忍像越南、琉球那样无端丢失。自清朝建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它除了偶尔与日本有过往来外，与西方其它国家并无交往。不过随着中国与日本相继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也逐步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法国人、美国人都曾不惜以武力相威胁，然而都在朝鲜的反抗下未能成功。

面对西方不断施压，中国早已自顾不暇，更无力保护朝鲜。自1867年始，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和解，建立适当的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对此，朝鲜方面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它既不愿意向西方开放，更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不屑一顾，以为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与西人交好，不过是化为夷狄，与禽兽无别，朝鲜坚守不与日本交往的原则，宣布“与日本交际者处死刑”。对于清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再劝告朝鲜与西方接触，朝鲜政府感到非常不舒服，这对中朝宗藩关系无疑投下了阴影。

朝鲜的冷淡使通过维新运动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为不满，日本政府遂于1875年准备以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并为此专门委派使者前往中国试探清政府的反映，而中国政府此时正穷于应付各种外交危机无力东顾，只得告诉日本，称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清政府的这一动作显然与其宗主国的地位不太相称，无疑是在推卸自己的保护之责，是一种角色混乱。

受清政府的鼓舞，日本决心以武力促使朝鲜开放，而清政府为避免冲突，遂指令朝鲜与日本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一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的权力；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中国没有履行宗主国的权力维护朝鲜的利益，中国在朝鲜的影响显然在下降。

中国政府当然不甘心就此放弃朝鲜，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对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更加敏感。为了抵消日本对朝鲜的影响与控制，中国政府在无力履行或不愿履行宗主国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决定推动朝鲜对西方国家开放，试图借助于西方各国的均势抵消或减弱日本的影响。这一政策选择毫无疑问是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当然也就放弃了宗主国的王道政治伦理。清政府对朝鲜的帮助与劝告，实际上只是一个友邦的做派，不再具有宗主国的风范。

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此后数年，中国还促成朝鲜与英国、法国、德国签订了类似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朝鲜的对外开放及现代化进程。中国在朝鲜的影响也因此而明显有了上升的趋势，朝鲜依然自认为是中国的藩属。

日本对中国在朝鲜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驻朝公使努力在朝鲜政坛培植亲日派。1884年12月，朝鲜内部的亲日派在日本的支持下，乘中国忙于中法战争无暇东顾的机会突然发动政变，中国驻朝军事将领袁世凯迅即出兵镇压，平息了叛乱，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发生正面冲突。为了协调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专使伊藤博文于1885年4月18日在天津缔结条约。由于此时中国政府和李鸿章的精力都用在中法战争上，因此在朝鲜问题上不得不向日本让步，使朝鲜由先前中国为惟一宗主国的权力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力，这就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 群雄逐鹿东北亚

日本的姿态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事件，清政府派员到朝鲜推行洋务政策，企图以“以夷制夷”的手段借助列强牵制日本。结果使朝鲜成为各国势力角逐的场所，使朝鲜和中国更加受制于美国和日本，并逐步形成英美日三国联合的态势。

从中国统治层看，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不是没有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们一是盲目乐观，相信中国海防和军事实力经过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刺激、发展，“已有深固不摇之势”<sup>[③]</sup>。同时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中日一旦发生冲突，由英、俄出面排解，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听凭各国摆布。

虽然日本通过1885年的中日条约从中国分享了在朝鲜的权益，但鉴于当时的国际格局尤其是列强对朝鲜的觊觎，日本并没有立即设法清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相反，日本竭力鼓动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影响，期待由中国抵制西方对朝鲜的插手。然后待日本的经济及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再由日本与中国正面交涉，这样就可以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而不必牵涉到西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日本可能遇到的障碍。

日本的战略似乎并未引起中国的警惕，日本在分享了国家对朝鲜的保护权后的退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李鸿章的虚荣心，他遂委派极其能干的亲信袁世凯为驻朝全权代表。经过几年的努力，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和政治、经济决策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力。袁世凯的强势与中国影响的扩大确实抵消、遏制了西方对朝鲜的觊觎，但却正中日本的下怀。而且，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或削弱自己在朝鲜的活动，其驻朝鲜使团积极培植亲日派，力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独享的保护国。1894年3月28日，朝鲜亲日派领袖人物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身亡，其尸体被朝鲜政府运回后凌迟示众以警示那些亲日派。这一事件在法理上虽说与日本无关，但日本朝野无不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日本权益的冒犯，极端好战分子呼吁不惜以战争维护日本的尊严，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竭力鼓动曾被朝鲜当局镇压而被迫转入地下的东学党策动反政府运动，以便混水摸鱼，进而取代中国控制朝鲜。

在日本的鼓动下，东学党利用群众自发抗议官僚贪污的情绪，于1894年4月初发动反政府运动。此时的朝鲜政府具有明显的亲中倾向，当东学党发动的反政府运动日渐扩大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向中国政府求



援。6月1日，朝鲜政府向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秘密表示了求援要求，希望清政府派遣军队协助平定东学党反政府运动。对于朝鲜的求援，清政府也曾有所犹豫，然而日本方面在获悉这一消息后，却支持中国采取积极行动，并向中国政府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对此，中国政府尤其是李鸿章信以为真。6月4日，李鸿章奏请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准军分批进入朝鲜，开抵牙山。6日，中国政府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

中国的决定正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因为只有如此，日本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向朝鲜派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一个混成旅团前往朝鲜。5日，日本组建战争体制，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直接隶属于日本天皇，并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兵。

当中日两国军队向朝鲜集结的时候，朝鲜政府已基本平息了东学党的反政府运动，局势趋于平静，中日两国驻军朝鲜的理由都不复存在，因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走，朝鲜也要求日本撤军。然而日本根本不理睬中国与朝鲜的要求，除了源源不断向朝鲜派兵外，还于6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为了防止朝鲜再度发生内乱，必须改革朝鲜的内政，试图以武力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借机向朝鲜大规模增兵，决心促使中日关系破裂，但在表面上继续释放不再增兵的烟雾，麻痹中国政府，使中国驻朝鲜军队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

对于日本的真实用意，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并非茫然无知。李鸿章按照既定方针一面寄希望于国际干涉，避免中日冲突，争取和平；另一方面，在主战派的促使下，也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加紧调军队进入平壤，暂时放弃朝鲜南部地区，背靠中国，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待格局，一决雌雄。就军事布局看，李鸿章的方案无可厚非，是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只是未容实现这一布置，日军先下手控制了朝鲜政权，并对中国不宣而战。

6月21日，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建议。第二天，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与中国绝交，向朝鲜增兵，由日本单方面迫使朝鲜进行内政的全面改革。28日，日本要求朝鲜宣布对中国完全独立。7月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促使中国从朝鲜撤军，并限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7月22日，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宫，将王室成员带到日本使馆，囚禁国王，威逼国王生父大院君出任朝鲜国王摄政，组织政府。25日，大院君被迫宣布废除中朝条约，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同一天，日本巡洋舰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在朝鲜附近海面击沉中国军舰高升号。27日，朝鲜国王迫于压力下于日本使馆宣布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中国军队从朝鲜驱逐出去。29日，日军向聂士成部发动进攻，迫使聂部会同先期撤离的叶志超部辗转后撤至平壤。李鸿章设计的战略布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

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日军向平壤进攻，左宝贵率部抵抗，壮烈牺牲。叶志超被迫下令军队放弃平壤，后撤至鸭绿江。平壤战役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9月17日，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展开激战，根据李鸿章事先计划，北洋海军的战略方针是退敌于国门之外，所以北洋海军坚持守口，不敢贸然出战，以便保持“猛虎在山之势”。在这个大战略背景下，日本海军轻而易举获得了海面控制权，使北洋海军坐困于港内。面对如此不利的战术态势，北洋海军将士不甘束手待毙，不得已出海作战，“致远”舰身负重伤，管带邓世昌鼓轮猛冲求撞敌舰；“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和全舰将士坚持战斗，与舰俱毁。其后，北洋舰队经旅顺口撤退至山东的海军基地威海卫。11月，日军由陆路攻占大连和旅顺口，进而向辽东半岛推进。翌年（1895年）2月，日军抄后路攻陷威海卫。这一系列偶发事件不仅使中国海军损失惨重，中国经三十年“自强运动”创建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没。

平壤、黄海战役的失败，彻底粉碎了中国政府、军队、人民的信心、信念，而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的激励下，海陆并进，长驱直入，直取中国腹地。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政府的暗示，向日本求和。

如果就中日双方的实力看，中国虽然在平壤、黄海战役中损失惨重，但战场既然已延至中国本土，如果清政府能依靠广大民众和纵深腹地坚持抗战，恐怕日本也难坚持太久，以时间换空间，战争态势必然随着时间而变化。无奈清政府被日本一连串突然袭击打晕了，更不可能看到民众的力量，只能屈辱求和。

失败的中国已无外交可言，日本政府竟然拒绝承认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议和大使，指名要求清政府委派位尊权重的李鸿章前往日本进行善后谈判。经过一段紧张、惊险的讨价还价，中日两国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享有完全的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至此，历时几代奉中国为宗主国的东亚宗藩体制完全解体，远东政局开始陷入一轮新的混乱之中，至今不得安宁。

作者简介：马勇（1956-），男，安徽淮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

[①]（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1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②] 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5），80页，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2，4页。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